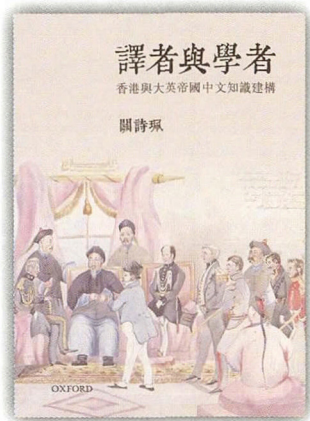


# 英国汉学的传统兼论译者的作用 ——《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 知识建构》评介

◎ 杨华波



《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书影

## 引言

汉学是一个比较含混的名词。在中国本土，它既是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学术的称呼，也是与“宋学”对立的一种学术导向；在国外，西方概念和意义上的汉学，泛指一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周宁，2004：5）欧洲大陆的汉学研究滥觞于16世纪，由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等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创，他们通过对中国文化、宗教的研究，拉开了欧洲汉学的序幕。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837年才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设立了全英首个中文教席，侧重于学术研究，担任中文教授的修德（Samuel Kidd）于1843年离世后，该教席也随之停办。然而，鸦片战争及之后对华事务的增多和后续管治香港的需要，使得译员的培养和汉学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并逐渐将英国汉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带到

十分务实的境地”（关诗珮，2017：93）。

《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的作者关诗珮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专长包括翻译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和英国汉学史。该书是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集中呈现了她自2010年以来围绕这一专题所做出的众多研究成果。在港译员因为其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成为英国政府对华交往中必须倚仗的力量，他们广泛活跃于帝国殖民时期的商贸、战争、和谈、外交、殖民地管治等各个领域，要全面论述他们的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该书采用以点及面的研究方法，集中呈现以斯当东（George Staunton）、飞即（Samuel Fearon）、威妥玛（Thomas Wade）和理雅各（James Legge）为代表的译员或主导译员培训的关键人物在建立英国汉学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以及香港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 一、内容概述

该书正文共分六章，其中绪论和总结部分单独成章。在绪论中，作者将译者和学者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点出了该书的要旨，即：研究鸦片战争是如何推动英国汉学的形成及香港地位何以如此重要。（关诗珮，2017：8-9）。作者立足于将译者研究纳入到广义的翻译研究之中，同时“希望结合传统的汉学研究”（同上：23）以研究这一课题。关于中国研究这一称谓，欧洲大陆多称“汉学”，而作者通过钩沉英国这一学科的发生史指出，英国的汉学在起步和目的上与欧陆汉学有着显著差别，“中文知识”（Chinese knowledge）或许是更合适的称谓，并呼吁

历史学家“更审慎使用 British Sinology (英国汉学) 一词”(同上: 33), 为了给英国的中文研究正名, 书名上选用“中文知识”一词, 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 全书仍使用常用的汉学一词(同上: 35)。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 作者描绘了一群在港译员或译者群像, 通过一系列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还原了英国汉学开创初期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同时强调了香港在英国汉学中的独特地位。

### (一)“英国汉学之父”斯当东的拓荒之旅和开创之功

作者在第二章中指出: 由于英国来华传教较晚且一贯不注重译员的培养, 使得英国在来华访问洽谈等事宜和鸦片战争中吃尽了苦头。为了适应英国在华贸易和殖民利益的扩张, 英国政府在有识之士, 特别是斯当东的积极推动下, 逐渐在伦敦大学学院、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等研究机构设立中文教习, 聘请在华工作服务多年的译者(如飞即)担任中文教授, 开始为帝国译员的培养创造条件。斯当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汉学之父”, 是与他对于英国汉学的赞助分不开的。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将翻译中的赞助者定义为拥有可以促进或阻碍阅读、写作或改写权力的个人或机构, 赞助者可以通过经济要素等各种力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Lefevere, 1992: 15-17) 推而广之, 斯当东对英国汉学的建立和译员培养等翻译活动起了很大的赞助作用,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不仅是 1793 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访华和 1816 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访华的随团人员和见证者, 更充当了译员的角色, 深知译者在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他本人的汉学造诣极其深厚, 最早将《大清律例》翻译为英文, 为西人了解清朝律法打开了一扇窗, 并与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汉学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最后, 作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的智囊, 从政后的斯当东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力, 积极推动英国高校设置中文教习, 从资金来源到教授选聘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中文教席停办后, 他又推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设立中文教席。为适应英国对华交往的实际需要, 选聘拥有译员背景的飞即担任教授, 为英国汉学的务实传统定下了基调。此外, 他还参与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等机构的筹建和运作, 为英国汉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 (二) 隐身的译者——飞即

第三章中, 作者借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隐身的译者”概念(Venuti, 1995), 挖掘出了一位历来被忽视的译者——飞即。不同于译文中译者因为要符合译入语的标准而被迫隐身, 飞即的隐身或被遗忘却“来自对译者工作性质的要求”(关诗珮, 2017: 133)。作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首任中文教授, 飞即在英国汉学发展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但由于他主要从事口译活动, 且本人未留下回忆录等资料, 因此, 追踪和评定他的贡献较为困难。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爬梳, 寻找各种旁证, 较完整地勾勒出飞即的译员生涯及其贡献。飞即不仅参与了化解林则徐因逼迫英美商人上缴鸦片而围困商馆的危机, 还参加了鸦片战争, 在广东的战事中作为译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途因染上痢疾返回澳门医治, 但他的语言能力和贡献还是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肯定。战后, 英国政府不仅授予他荣誉勋章, 还在殖民地香港对他委以重任。到 1844 年香港政府面临统治危机时, 更是在与华人市民的沟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使得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决定擢升飞即就任香港登记署总登记官。1845 年 7 月, 飞即最终决定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中文教席, 任期 5 年(1847-1852)。事实上, 飞即本人的志向并不在汉学研究, 为了开启另一个职业生涯, 他于 1851 年考取了医师执照, 可惜因病于 1854 年逝世。飞即没有份量十足的汉学研究著作, 他的任命也并不是国王学院中文教席的首要人选, 但如果从整体上考察英国汉学的发展脉络, 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正如作者所说, 这“实在反映了英国在 19 世纪殖民及帝国主义狂飙时期, 处于欧陆军事及国力竞赛下, 英国汉学在欧洲的自我定位, 以及反映了英中关系外交触碰后的起步点”(同上: 230)。

### (三) 自学成才的汉学家威妥玛的汉学追求和译员培训计划

第四章中, 作者挖掘了汉学家威妥玛在“中国学生译员计划”中的重要作用。威妥玛因为其制定的威妥玛式拼音蜚声国际。但是, 作为一个在军队、外交等领域均取得不俗成绩的多面手, 他在英国译员的培养方面也贡献巨大。威氏本人通过苦学掌握粤语, 初时受雇于香港政府, 成为专职的译员。作为军人和译员的威妥玛亲历两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他作为来华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的翻译参加了天津

和谈。之后，他担任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并最终成为英国驻华公使。在上海工作期间，威氏进一步掌握了北方官话，并致信外交部陈述自己的学生译员计划。在英国外交部的支持和赞助下，威氏成为中国学生译员计划的主导者，身体力行编写了各种汉语学习教材，如《语言自述集》《自述集》；制定了详细的学习内容和评估体系，为译员的体制化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样，在这里我们再次见证了“大英帝国对翻译部门的权力赞助”（关诗珮，2017：330），它在经济和政策制定实施上对威氏本人给予了全力支持。威妥玛之所以能够在管治香港和对华外交中被委以重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其作为译员拥有良好的语言能力，而这种优势反过来促使他在驻华外交生涯中不遗余力地推进译员培养的本地化。虽然他本人于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他的译员实践和汉学研究均体现了浓厚的实践性。

#### （四）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与翻译官学生计划

第五章中，作者挖掘出了理雅各在汉籍英译之外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即提出并参与了“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为大英帝国培养了众多人才。理雅各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研究型的汉学家，作为汉籍英译的巨擘，他前后花费了20多年时间翻译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他于1875年荣获首届法国汉学界儒莲奖，为英国汉学的长远发展和学院派学风的转向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同时，作为传教士的他，因为在传教过程及在香港多年的岁月中目睹译员不足造成的管治危机，从而提出了培养译员的计划。这一计划由英国殖民地部主导，香港政府鼎力支持，自1861年开始执行，培养了诸如第17任香港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和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后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文教授的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等人。此计划后来逐渐扩张，演变为更加宏大的“东方翻译官学生计划”。可见，理雅各不仅在英国汉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奠基性贡献，其顺应英国发展需要而提出的译员培养计划也有深远的影响力。

在第六章总结部分，作者对全书主要内容作了简单的回顾，指出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中英两国关系和英国的译员培养制度上都有重要影响，而基于实用目的培养的译员一方面便利了大英帝国的对华交流和殖民地治理，另一方面也奠定了英国汉学不同于欧陆汉学的实用传统。而其中，香港的地位是举足

轻重的，它是“‘译者与学者’计划的重要基地、攻防地和桥头堡”（关诗珮，2017：399）。

## 二、主要学术贡献和不足

作为翻译史和汉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力作，该书广阔的学科视野和扎实的文献挖掘让人印象深刻，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史料丰富、立论扎实

翻译史研究以译者或译员为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探究他们工作过程中的史实及其在“文化、社会及历史上带来的贡献”（关诗珮，2017：5）。因此，为了探究该书中关涉到的译者的史实和贡献，尤其是斯当东、飞即在英国汉学初创阶段的贡献和威妥玛、理雅各在译员培训计划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不辞辛劳地查阅了大英博物馆及图书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大学档案馆和民间及私人的档案室等各处资料，在挖掘资料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下足了工夫。比如，作者通过发现170多年前威妥玛学习粤语的手稿，从而揭示了威妥玛学习粤语的教材和途径。推动英国汉学研究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对华殖民过程中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其中尤以译员的极度缺乏成为主因，这个结论立足于一系列书信、手稿和官方档案，具有扎实的文献依据。此外，在以往关于英国汉学史和汉学发生史的研究（如胡优静，2007；熊文华，2007）中，汉学家的译员生涯和背景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都是该书的新发现和学术贡献。

### （二）澄清错讹，重树史实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真实可信的前提之上，尽管对于何为历史的真实存在争论，但起码应该做到有理有据。以往涉及该书主要人物的研究，要么因为资料占有不够，要么因为以讹传讹，造成了诸多史实上的错误。作者基于丰富的一手资料和档案，有力澄清了多处错讹，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译者和伦敦国王学院的首任中文教授，飞即几乎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连他的姓氏和名字也被拼错或张冠李戴（关诗珮，2017：135）。作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不仅澄清了飞即的姓名，更考证出了飞即作为译员在鸦片战争和英国汉学初创阶段的贡献。基于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观点，以往的翻译活动应被置于社会文化的框架下重估。（Touy,

1995)通过考察威妥玛在华期间编撰的一系列著作,如《寻津录》《语言自述集》,作者指出:以往研究此类著作的学者多采取汉语教学的角度,而其“真正作用和最终目的是要训练翻译专才”(关诗珮,2017:325)。总之,书中多处对以往错误史实的澄清和新论点的树立,让人豁然开朗。

### (三)跨学科意识强,开拓了口译史研究视野

虽然作者在该书的绪论部分申明:本书是基于“传统的汉学研究以及今年新兴的学术科目‘翻译研究’而来”(关诗珮,2017:12-13),但该书的实际内容却远远超出了作者设定的范围,涉及了香港历史、中英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一项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极大开拓了翻译史,尤其是口译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口译史研究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的翻译史研究,口译史仍处于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正如皮姆(Anthony Pym)所言,翻译史的研究应该以译者为中心(Pym,1998:xxiii)。该书中,作者以译者为中心,刻画在港译员的群像,关照了译员在军事和殖民地管制等领域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跳出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和叙述框架,将译员与英国汉学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再反观译员在具体历史场景下的成长和经历,不仅拓展了译员的身份,更开拓了口译史研究的视野。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部分内容在篇幅上并不均衡。例如,第三章中对“隐身的译者”飞即似乎叙述过多,这部分的内容在篇幅上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总和,且该章内有两节内容与飞即无关,读后让人不免有突兀之感,降低了本章和全书的衔接性。其次,理论和史实的结合还不够。在该书的绪论部分,作者列举了诸多翻译研究的著作,虽然其目的是为本研究的视角和取向张本,但后续各章基本上都围绕译员的个人经历展开,理论联系史实不够密切,且议论深度不够。最后,该书似乎忽略了阐释何为“中文知识”,这点不仅是英国汉学不同于欧陆汉学的典型之处,同时也是有译员背景的汉学家建立英国汉学知识谱系的内容。遗憾的是,作者除了在结论部分一笔带过外,并没有在各章中具体呈现。此外,该书出现了过多的印刷错误,出版方作为一家享有盛誉的出版社,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 三、结论

英国汉学的传统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

异,不同于法国等欧陆汉学在耶稣会传教士影响下奠定的汉学基础,“侧重书面文字训诂,轻视口语翻译训练”(关诗珮,2017:228-229),英国汉学一开始就另辟蹊径,采取注重译员培养的实务路径,并通过斯当东、飞即、威妥玛和理雅各等人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条路径的选择不仅是英国本土汉学根基不牢、人才缺乏的无奈之举,更是适应大英帝国在华殖民扩张的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足够且合格的译员,以满足对华政治经济交往及治理香港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实践性。香港作为英国殖民东亚的重要据点,其治理需要大量译员的协助,这体现在:早期众多管治危机需要谙熟中英语言和文化的译员来调节与化解,香港政府亦大力提拔掌握粤语或中文的公务员。19世纪参与中英两国事务的众多译员往往都有香港背景,这不仅是因为早期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更是因为香港为译员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和工作契机。总之,就培养对华译员而言,香港不啻为一块肥沃的土壤,而这些早期在港译员或译员计划领导者注重实用性的务实导向也奠定了英国汉学的传统。 □

### 参考文献

- [1] 关诗珮.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 [2] 胡优静.英国汉学走向专业化的轨迹——19世纪英国汉学史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7.
- [3]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4] 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13.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6]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 [7]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8]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杨华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llenjung165210@163.com